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THE SERIES OF ADVANCED-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顾问

任继愈

庞 朴

主编

王中江

新儒学与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

中国哲学

景海峰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THE SERIES OF ADVANCED-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顾问

任继愈

庞 朴

主编

王中江

新儒学与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

景海峰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景海峰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 1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ISBN 7 - 5348 - 2243 - 2

I. 新… II. 景… III. 儒家 - 研究 - 现代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125 号

责任编辑:卢海山

责任校对:温向芬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890mm × 1240mm A5

印张:10.25

字数:296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 - 5348 - 2243 - 2/B · 70 **定价:**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当回首 20 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呢?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在此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相应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这种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有人甚至对通用已久的作为代表“中国学问”一个方面的“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理由好像是说,“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长于西方并适合于西方,

它所承负的那一大套东西都是与西方文化整体联系在一起的,让它成为代表中国一部分学问的化身,就使中国学问丧失掉了它的真实面目和独特性。在这种忧虑之下,拒绝西方观念和范式在中国运用的主张和放弃“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这样的说法如何呢?按照这种逻辑,撇开自然和技术领域,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几乎所有领域所使用的近代翻译过来的大量源于西方的“术语”(许多是通过日本)都得放弃,用这些术语所命名的学科和学术分类都得改弦易辙。

且不说这样做的可能性如何,关键是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意义。张之洞很早就拒绝使用“哲学”这一术语,因为他把“哲学”只看成是“西方之学”,因此试图以“名学”或“理学”代替“哲学”;王国维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哲学是中国的固有之学,只是用名不同罢了。当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先生用“哲学”这一术语分别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他们都认真思考了运用“哲学”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并从此出发建立起了为时代刻上了印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即使在西方,“哲学”概念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概念,就像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一样。如果不从类的观点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因为“哲学”术语起源于希腊,如果只能把它与希腊相联系而有所谓“希腊哲学”,那么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都不能称作“哲学”。“哲学”概念在中国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哲学”就“等于”西方所说的“哲学”。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如何在使用中不断地为“哲学”赋予新的意义,而在于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哲学的丰富意义。同样,“中国哲学”也不是固定的产物,它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理解特别是那种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转化”和“转生”。



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学问所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教条化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决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严格来说,这些术语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内在部分。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反讽局面,即大量使用着翻译过来的源于西方“术语”的人,却同时又一味地主张放弃这些术语。这样,在他们的这种态度之中,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要求放弃这些“术语”还是要求放弃他们的立场。我们毫不保留地赞成检讨和反思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并为不能在此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而忧虑。一种积极的办法是,我们在“谨慎地”并通过艰苦努力以“有效地”运用外来范式的同时,也要努力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范式来。不从事这种积极性的工作,而只是从表面上做文章,说到底不过是自欺欺人。必须承认,在一种情绪式民族主义和廉价式保守主义之下,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困境,同时也就落入到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陷阱。用这种立场研究中国哲学,我不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鼓舞人心的东西。

中国哲学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谨慎的态度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从不少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积累,但这种积累还是远远不够的。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我们摸索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式并获得突破。公正的历史原则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它的方式选择我们或者是抛弃我们。

带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和范式更新的渴望,抱着激发问题意识和主题重建及新领域开拓的期待,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关林、总编辑张存威、副总编辑郭孟良和编辑卢海山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宽泛意义上的“前沿”要求我们的研究能够体现出至少一个方面的特点:或者是新问题、新领域;或者是新范式、新方法;或者是新文献、新证据;或者是新探讨、新观

点。即便这样,我们也仍然不敢说列入丛书的著作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承诺,请宽容的读者在一个相对意义上理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我们所说的“前沿”。作为这套丛书组成的海外部分,我们选择的是具有悠久汉学研究传统的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的重要著作,我们非常感谢他的授权(他的著作由杜勤等先生不辞辛苦地翻译出来)。庞朴先生往往以非常谦虚的态度命名他的著作,《文化一隅》再次体现了他的这种风格,我非常感谢他惠赐他的著作列入丛书。《中国观念史研究》是希望能够反映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而选择一些作者的论文汇集而成。除此之外,这套丛书的作者还有景海峰、王启发、任文利等先生和我本人,身在丛书之中自然难免冒领“前沿”,不过我们会以谦虚的心情接受读者的批评。

王中江

2002 年 10 月 24 日



目 录

1/	总 序
1/	导 论 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未来走向
2/	一、身份裂解带来的意义迷失
7/	二、西学观照中的合法性焦虑
10/	三、现代性冲击下的尝试性策略
13/	四、面对全球化的未来定位
19/	第一章 梁漱溟思想的背景及曲折
20/	一、早期思想之佛学因缘
20/	（一）功利主义
24/	（二）究元决疑
29/	（三）印度哲学
38/	（四）唯识述义
41/	（五）东西文化
44/	二、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受容
45/	（一）如何面对
49/	（二）如何理解
53/	（三）如何受容

57/	三、梁漱溟的出世间与随顺世间
57/	（一）在出世与入世之间
62/	（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
66/	（三）解释世间与改造世间
69/	第二章 熊十力哲学的渊源及其方法
70/	一、“新唯识论”与佛教唯识学
71/	（一）“深叩内典，专攻唯识”
81/	（二）从《唯识学概论》到《新唯识论》
90/	（三）由佛转儒：对唯识学的检讨
99/	（四）创造性的转换：唯识学的中国化
108/	（五）现代佛学的一大公案
123/	（六）“新唯识论”在现代佛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131/	二、熊十力哲学的量论
132/	（一）比量与证量
140/	（二）心本论
148/	（三）默识证会
159/	第三章 和而不同两大师：熊十力与梁漱溟的争论
159/	一、交游始末
165/	二、相互辩难
173/	三、两人异同
178/	第四章 冯友兰的形上学追求和哲学史建构
179/	一、“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
189/	二、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
190/	（一）建构前史
195/	（二）框架性协议
199/	（三）缝隙与壕堑
204/	（四）在修补和重建的两难中
208/	第五章 唐君毅的人文情怀与宗教祈向
209/	一、生平与著作述略
209/	（一）生平简介



210/	(二) 著作概览
226/	二、新人文观及宗教化的儒学
226/	(一) 何为人文主义
230/	(二) 人文与超人文
236	(三) 宗教化取向
243/	三、唐君毅对华严思想之阐释
253/	第六章 牟宗三的文化观与圆善论
253/	一、文化哲学及其历史观
254/	(一) 文化的理念与历史的理念
259/	(二) 中西文化的比较模式
263/	(三) 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
266/	(四) “内圣外王”的困惑
268/	二、圆教与圆善：牟宗三哲学的核心思想
269/	(一) 何为圆教
273/	(二) 圆善之证成
276/	(三) 对圆善论的分析批评
281/	第七章 海外新儒学的探索
282/	一、刘述先的新儒学思想
282/	(一) 生平与著作
286/	(二) 传统与现代的思考
293/	(三) 当代新儒学与系统哲学
299/	(四) 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
304/	二、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304/	(一) 与新儒家的关系
306/	(二) 对新儒学的反省与批评
309/	(三) 创发性延伸和批判性超越
315/	后记



导 论

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未来走向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巨大变迁,儒学的现实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儒学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一变而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并极度地边缘化和沉隐化了。原有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形式而作为绝大多数士子之共业的儒学,也逐渐地蜕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人还在说辩腾喧于口的落寞之言。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之中,儒学遭遇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其一,工业化过程逐步瓦解了乡村社会的基础,村社结构和它的宗法形式均出现崩裂,聚落、宗族、家庭,以及人际间的联系都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建立在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态基础之上的文化原核和它的宏大叙事在根本上遭到了质疑和颠覆,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从此由丰沃变得贫瘠。其二,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流行儒学的东亚地区都经历了类似的工业化的冲击,而致使传统儒学遭遇危机乃至解体,那么中国比之韩国和日本就更多了一重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使得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命运更显凄凉和悲惨。从晚清到“五四”,政治救亡的急切情态竟生出强烈的文化上的哀怨,将儒学认定为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于是乎,形形色色的批判和打击便接踵而至、连绵不绝,形成了一百多年来世界文

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化的强力解构之后,儒学不但退隐到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外缘,而且附着了许许多多难以洗刷的污迹,这种种的负面价值勾连起了一幅当代人脑海之中的儒学印象图,并时不时地表露于各种偶然的提及和种种专业化的论说当中。

儒学在经历了上述的两重解构之后,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生命力可言,即使是形式上的合法化存在也只是最近几年才稍稍有了一点转机。而就学术形态来说,今日所谓的儒学和传统的儒学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在经过一个多世纪剧烈的动荡、裂变和转换之后,儒学已彻底地走出了经学时代的范式,被各种现代性的知识体系所分割和夹裹着,叙述的方式也大大地改变了。眼下,我们要想面对一个真实的儒学,就必须时时刻刻地意识到这一转型的现实存在和根本影响。只有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这一转换的大时代背景,才能在当前的语境条件下恰切地表达出儒学的思想内容,也才能对儒学的当下境遇和未来指向做出一个较为适度的衡估。

一、身份裂解带来的意义迷失

儒学发展到晚清,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西潮东渐,来势汹汹,外部的冲击已使之难以抵挡,就是儒学内部也渐渐地生发出了许多裂散的因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总结有清一代学术,解释“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时,举出了内、外各三因。内因一是考据之范围“甚拘迂”,未流落入空而不实;二是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其驹卒多为盛气凌人的“学阀”;三是自身发展,不断突创,必至异端涌现。外因一是“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学问必由虚逐实;二是咸同间,清学的根据地江浙一带“受祸最烈,文献荡然”,致“百学中落”;三是国难日重,西学渐输,学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对旧学体系做根本的冲击。^{〔1〕}钱穆也指出,“嘉道

〔1〕《清代学术概论》,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



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皆有“途穷将变”之迹。诸先进“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最后终导出康南海的“尽变祖宗之法”,于是乎传统彻底瓦解。^{〔1〕}“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未绝如缕了”^{〔2〕}。伴随着汉学主流的衰落,是宋学复振的呼声、今文经学的崛起和诸子学的兴盛,正是在汉宋之争、今古文之辩和经与子的重估之中,一步一步瓦解了儒学的威权,熔蚀掉了儒学的身份性,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终结。

清代后期的复宋思潮以“经世”为志帜,它并非简单地回到宋儒的义理之学,和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也不尽相同。面对考据的学术霸权,先是理学家唐鉴等人发出抗争的声音;继之桐城派的方东树挑起了汉宋争论的巨大波澜,曾国藩以理学名臣身份所创下的经国大业无疑为复宋势力增添了重要的砝码;最后是岭南陈澧等人调和汉宋的努力,不但打击了乾嘉学术的正统观,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汉学家阵营和扭转清末汉学走向的作用。宋学派、桐城派、调和派均站在正统汉学的对立面,对乾嘉考据学的权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动摇了汉学的独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学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层面,服膺宋儒的道德义理,因缺乏对应现实的创造性而逐渐地被边缘化了。到了嘉庆年间,开始有一部分理学人物力图纠正这种偏差,重新将社会政治内容纳入到儒家的信仰体系当中。如唐鉴的“守道救世”说,虽不离“守敬”和“穷理”的道德根本,但还是对儒家经世致用的关怀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如果说积衰已久的理学阵营已难以撼动汉学的正统地位,那么,来自桐城派的方东树则以《汉学商兑》一书给了对方以沉重的打击。方著可以看作是汉学权威强压之下的一种反弹,所谓“孤踪违众,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胜也,要心有难

〔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2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6页,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

已”〔1〕,颇能道出作者的心迹。对于江藩《汉学师承记》门户森严的谱系学,来自汉学阵营的焦循等人只是委婉商榷,而龚自珍则以考核名实(“十不安”)的方式提出异议。惟有方东树直截了当,以强大火力直攻汉学要塞;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罗列材料,枚举事实,对汉学家中重头人物的言论,逐条批驳。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汉学弊端,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斥汉学“六蔽”之第四条,“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2〕。这是指当时汉学家“内苞污行,外饰雅言,身为倡优而欲高谈伏郑”的普遍情形。〔3〕《汉学商兑》后来因得到曾国藩的大力表彰而风行一时,从此对考据家的抨击日起而日兴,汉学威势开始走向衰落。陈澧《与徐子远书》中的一段话即颇能道出道、咸之间小学颓败的消息。“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后生辈好学者,则不过二三人耳。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尽时文之为害”〔4〕。至此,汉宋调和之风日盛,汉学阵营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岭南派为中坚的综合汉学与宋学的运动,晚清学风随之大变。

反汉学思潮的得势,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清代义理、考据、词章三大学术板块的力量比重发生了改变,考据学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宋学派的义理和以桐城派为代表的词章借学术复古的面貌重又恢复了自身的价值,夺回了自己在儒学中应占有的份额。但实际上,打落汉学正统派权威的既不是义理也不是词章,而是经世致用之学。反汉学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强调经世致用,这正是乾嘉考据学的致命弱点,以此为利器,对垒之下,汉学焉能不败?但是,以经世思想批判汉学,同时也就面临了脱轨的危险,传统儒学结构中的三个板块可能一损俱损、一起打落,义理、词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儒学的。如果说汉宋之争尚能保持在传统儒学的体制之内而尚未出轨,那么,随之而来的

〔1〕《汉学商兑》序例。

〔2〕《汉学商兑》卷下。

〔3〕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如谓毕沅门下,洪亮吉、孙星衍、汪中三人。“亮吉素狂放,肆情声色”。“星衍卓犖不羁,嗜利若渴”。“中行尤薄,肆毒室人,兼工刀笔,尝以构讼攫千金”。可见方东树所言不差。

〔4〕《东塾读书记》,341页,三联书店,1998年“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本。



今古文之争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学,宣告了经学时代的完结。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盛,在形式上是“反之又反”,由东汉上溯到西汉,“以复古为解放”;而实质上从一开始它就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与汉学正统派大异其趣。譬如,同为《公羊》文本,汉学家孔广森的解说不为今文学者所宗,并不是其“不明家法”,而是因为他抛弃了公羊学的政治关怀,将寄寓现实感怀的无穷大义,“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1〕。实际上,自刘逢禄以下的今文家逐渐扬镳两途。邵懿辰、戴望、王闿运、皮锡瑞等能遵守经学的游戏规则(所谓“家法”),与古文家构成了内部的学术对垒。他们一般都远离政治,对今文经的注释只有纯粹的学术兴趣,在经学的轨道之内只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却不可能发展成为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运动。而龚自珍、魏源,特别是康有为,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今文经学的历史被他们滑转,内容也被抽离化为象征性符号,“喜以经术作政论”〔2〕,“轻古经而重时政”,“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3〕。实已超越了经学的范围,不只是从根本上抛弃了考据学,而且也暗暗地告别了整个经学系统。

所以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说魏源“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乱越无条理”。此并非过言。这是依经学之标准所下的学术判断。太炎直到晚年仍认为,“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魏源“杂糅瞽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4〕。龚、魏既已如此,康有为的学说就更不是什么经学了。“康氏对公羊学派有兴趣并非是纯学术的,而是其中所含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他似仅取他认为真实的公羊说(或适合他自己说法的),而无视那些他所不赞同、不需要的”〔5〕。被喻为“大腿风”、“火山大喷火”的《新学伪经考》、《孔子

〔1〕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84页,东方出版社,1997。

〔2〕 《清代学术概论》,69页。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32页。

〔4〕 《章太炎先生论订书》,载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首,4页,岳麓书社,1998。

〔5〕 肖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改制考》二书,实可以看作是经学终结的标志。梁启超在总结“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术别辟新地;二是将孔子抽象化为一创造精神;三是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一切皆可怀疑批判;四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别黑白定一尊的观念完全被打破。^{〔1〕}这四条中的任意一条都能说明康有为是经学时代的终结者和新时代学术的前驱。今古文之争虽已越轨,后来所谈已不是经学,但至少还保留了一些经学的形式;而经子之争则名实均与传统经学了不相涉,已是经学圈外的事情了。所谓经学,直沦落为被客观研究、对比、审视,乃至至于批判和清算的对象。

清末诸子学的兴盛明显伴随着经学的凋敝而来。乾嘉时代,考据主潮不涉诸子;偶尔有一二留心者,也是非常的边缘。道咸以后,情况才稍有变化,而渐成气候,则是光绪年间的事。随着经学衰落和异端蜂起,对子学的考辨渐为人注意,不少汉学大师兼治《老》、《庄》、《墨》、《韩》等子书,成绩斐然。除了考据之业外,道、墨、法的思想价值也渐被人看重,拿来与西学相比附、与儒家相衡诘,进而成为捣毁经学殿堂的利器。这其中,以晚清国粹派最为突出。邓实等人倡“古学复兴”,以“古学”(先秦诸子学)和汉以后的经学相对抗,通过论辩“真孔”问题,抨击二千年来的经术和儒学。他们更将经学和君主专制划了等号,认为儒学在秦汉以后完全被腐化,成了专制帝王愚民的帮凶。黄节《孔学君学辩》谓:“其学能使天下之人,驯服而不敢动,而一听君主之操纵也。嗟夫,此则历代夷狄盗贼利用之,以市中国之人心而窥中国之神器,因而愚贱士民,使神州学术长伏于专制君统之下。”^{〔2〕}章太炎由经史研究转而考辨诸子,除了批判儒学之外,还将矛头直接指向孔子,其《诂书·订孔》、《论诸子学》等文“激而诋孔”,言词之峻烈在当时无出其右,实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河。如果说康有为的“任意涂抹”尚留个尊孔的外表,

〔1〕《清代学术概论》,72页。

〔2〕《孔学君学辩》,载《政艺通报》1907年第三号。



而章太炎则直将二千年经学累积起来的神圣性剥落殆尽。儒学只是先秦诸子之一派,比之道、墨等家不见得有何精彩。秦汉以后,儒学被专制君主利用、奴化,所谓经学实为民族之枷锁耳!至此,儒学还有什么可言?经学还赖何而存?只好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二、西学观照中的合法性焦虑

晚清考据学的衰落和经学的最终解体,使儒学一下处在了破碎和漂散的状态。清末新政诸举措、废科举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在社会动荡和近代化过程冲击之下农业村社的逐渐解体和宗族制度的趋于瓦解,特别是在如潮西学之中开始产生的新型知识阶层,这些因素使得儒学顿失其所,无处依归,在传统的结构中再也找不到消除危机、走出困境的资源。陈黻宸(1859~1917)《经术大同说》(1903)中有一段话颇能道出当时的情景:“况于今日,时势所趋,而百家诸子之见排于汉初者,今日赅赅乎有中兴之象,则皆与我经为敌者也。环海通道,学术之自彼方至者,新义迥出,雄视古今,则又皆我经所未道者也。”〔1〕所谓来自内部的“为敌者”,当然包括了晚清诸巨子。今古文两家,除了表彰诸子、涉猎佛学之外,无一不仰慕西学。康有为早在1879年之后便已努力不竭地吸收着西方知识。〔2〕章太炎至迟在《膏兰室札记》(1893)中已经引用了西书来诠释诸子。〔3〕1897年,他走出诂经精舍到上海参加维新活动之后,接触和吸收西学的天地更是洞开。随后两渡扶桑,新知大增。以诸子批儒、“激而诋孔”之时,也是他学习西学最为勇猛精进之日。所以,从经学阵营中冲杀而出的诸今古文大师,一手复活了“见排于汉初”的百家诸子,一手援引了“自彼方至者,新义迥出,雄视古今”的西学。

〔1〕《陈黻宸集》,上册,539页,中华书局,1995。

〔2〕肖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432页。

〔3〕如《问运至野者》引了英人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以释《管子·修廉》篇;《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引了侯夫勒的《谈天》和赫士译的《天文揭要》以释《白心》篇等。详见《膏兰室札记》卷三,《章太炎全集》(一),259~2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